

序：残酷的历史 另类的结局

北岛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句话洋溢着浓浓的历史情怀，而这情怀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中国人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中国人不相信末日审判，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审判。中国人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中国人相信有公正的历史。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中国的历史悠悠漫长，史料典籍汗牛充栋，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历史的见解，内容丰富，见地独特，传承了中国人读史、写史与评史的传统。其实，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中国人相信自己作为人的价值。

时间已然迈进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站在槛内往门外看，竟然发现逝去的几千年的历史仍然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令人留恋。凝思中，渐渐地有一些人的身影突显出来，霸占了我的眼球，他们是商鞅、李斯、窦婴、韩侂胄、贾似道、夏言……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都是堂堂的宰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结局却殊途同归，无一避免地遭到了杀戮。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的，他们血淋淋的死亡成了历史最坚实的注脚。

宰相在古代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现在仍有人在争论宰相到底是一个官职还是一个机构，这看来却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宰相以其实实在在的存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他们的行为不只包含自身的意义，还包含着时代的矛盾、要求与潮流。其中，皇帝和宰相之





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们总是互相提防、互相怀疑，甚至互相阴谋残杀。宰相的非正常死亡正是因此而发生。可以说，皇权和相权的斗争是古代政治史的一个软肋。

残酷的历史，另类的结局。这种结局渗着血光，让人为之感叹。



前言：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关于宰相的最早的记载大概要数商汤时的伊尹的事迹。

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到汤的孙子太甲做皇帝的时候，伊尹成了朝中元老，威望很高。太甲暴虐无德，不得人心，伊尹便把他放逐到桐宫。直到三年后，太甲悔改了，伊尹才把太甲迎回国都，还政于他。

《史记殷本纪》曾载：“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可见太甲经过这次放逐，悔过自新，使得诸侯咸来归附，百姓也得以安宁。后人把此功劳归于伊尹的贤能的辅佐，认为伊尹是后世宰辅的典范。不过《竹书纪年》却不这么认为，它认为：“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按此说，伊尹是个逆臣，篡了太甲的政权，自己做起了皇帝。这与传统的观点大不相同。

姑且不讨论伊尹是奸是忠的问题，但看伊尹放逐帝王的权力，已然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伊尹这个王臣却放逐了自己效忠的对象——皇帝，这说明了宰相在帝国中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一旦膨胀的话足以给一个帝国沉重的打击。

那么，宰相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

说得简单一点，宰相就是辅助帝王处理军国政务的大臣，是整个国家和朝廷的中枢机构，向上直接对皇帝负责，向下施政颁令统御百官，是运转帝国事物的关键所在。



关于宰相的历史非常悠久。宰相并不是沿袭一致的称呼，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称谓和定义。既然是研究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就要对宰相的来龙去脉作一个清晰的了解。

宰相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期，宰相的职位在各个诸侯国都建立了起来，称为相国。秦朝时，宰相的正式官名为丞相。汉承秦制，不过相国的地位较秦时要高。汉武帝时，政务中心则转到了内廷，宰相的职权逐渐转移到了尚书台长官的手中。汉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则由司徒、司空、太尉共同执政。汉献帝时，复置丞相。魏晋南北朝时，丞相或相国多为权臣自命，成为了一种篡位夺权的手段。南北朝制度多变，皇帝所与议论政事或委以机密者，即是宰相，官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或将军，其位最尊、权最大者则为录尚书事。隋朝定三省制，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唐朝改内史省为中书省，内史令为中书令，纳言为侍中。唐高宗后，只有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才是宰相。宋朝以“同平章事”为宰相正式官名。宋太祖时宰相地位大降。元丰改制，设宰相二人，首相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次相称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南宋建炎间，再改宰相官名为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主官中书令常由皇太子兼领，下为左右丞相。明朝初亦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中书省，废丞相，由皇帝亲决国政。宰相制度遂废。后皇帝以不胜庶务之繁，设内阁大学士协理文书。后内阁渐重，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居首者为首辅。清沿明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内阁成为闲曹，军机大臣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由此可见，宰相的称谓一直在变，甚至洪武时曾一度废除宰相，但宰相的实际作用对于帝国来说却不可或缺。宰相的废置与否都不能改变宰相作为帝国中枢的这一实际作用和本质的延续和沿袭。

宰相作为一个官职，对于帝国来说举足轻重，汉朝名相陈平论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



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朝廷内外的大事小情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言形容宰相毫不为虚。

宰相的所作所为关乎帝国的兴衰。小则影响其当政时的内外决策利益得失，大则影响帝国的历史命运兴衰荣辱，甚至一朝为相，却影响深巨，足以改变历史进程和前进方向，如商鞅为秦国丞相时实行变法，不仅强盛了秦国，而且其所创立的制度规范，还为二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提供了雏形，后世所沿袭的很多制度都是商鞅首创的。

宰相的地位如此重要，对它的评价也应该是中肯和客观的。评价宰相其人其事，不能单独论以忠奸，宜综合考量宰相所处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其悲剧的发生往往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时代的局限性，政治制度的弊病，以及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矛盾，都是促使宰相非正常死亡的诱因。当然，自作孽，不可活。对于因丧失人格，违背良心，想利用宰相的权限谋一己之私的宰相的非正常死亡，应属大快人心之列，即使这样，事件本身也不仅仅是罪有应得那么简单，它也存在不可违逆的必然性，个人因素只不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中国拥有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其中最鲜明的一条斗争线索是围绕君权和相权而展开的。两千年的浩瀚岁月中，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一刻也未停息，有时甚至愈演愈烈，达到白炽化的境地。作为皇帝，离不开宰相辅佐他处理政事，但是却担心赋予宰相的权力过大会威胁自身的统治，因此要对宰相的权力进行各式各样的限制和削弱，例如分割相权、虚化相权等等。不过说一千道一万，到底皇帝还是不能没有宰相的辅助，通俗地讲，帝国的事物繁复巨大，只凭皇帝一人的才干和勤于政务，恐怕浑身是铁也吃不消。于是，皇帝和宰相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当中：皇帝赋予宰相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当宰相权力过大危及君权的时候，皇帝就把宰相拉下马，再起炉灶。

皇帝和宰相就在这样的怪圈中争斗轮回。互有强弱，但大多的时



候还是宰相处于下风的。到了大明帝国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怪圈的作用力达到了顶峰。朱元璋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权力，在“胡惟庸案”发生后，废除了延续一千五百年的宰相制度，设立司礼太监，借以抵消内阁的权力，互为掣肘。

但不要以为君权和相权之间矛盾就此得到了解决，恐怕天不遂朱元璋所愿。君权和相权的斗争就像牛皮癣这样的顽疾一样，附着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皮肤上，无法治愈。只要君主独裁专制的制度依据尚在，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就会一再活跃，有所不同的就是过去叫宰相，之后换作诸如内阁首辅、次辅、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等称谓的替代品。君权和相权的矛盾是导致宰相非正常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宰相个人的人格特质和做事方式是导致其死亡的其他因素。人有大忠大奸。宰相既有心怀社稷致君尧舜的，也有以权谋私夺国篡政的；既有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也有藐视帝王无所顾忌的；既有生不逢时无可奈何的，也有一步青云祸国殃民的。不一而足。不过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两个有趣的现象，导致宰相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一是“当今的”皇帝不好，二是如果“当今的”皇帝是好的，那么皇帝的父亲一定不好。这不是什么真知灼见的规律，而是表明，宰相的非正常死亡，皇帝自身的喜好爱憎难脱干系。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宰相的非正常死亡不仅仅是历史故事的诉说，而是应该把这些浩如烟海的故事，放到今天的秤盘上去检验去衡量。古人也有“今天”，今人也有今天，两个今天同样很重要。柯林武德说：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诚如斯言，宰相的非正常死亡与其说是勾勒宰相的心路历程，不如说是笔者自身的一次心灵的回归和重新认知。苟能给读者带来同样的感受，笔者甚感欣慰！

郑国明

2006年11月10日

商鞅——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档案——

姓名：商鞅，又名卫鞅

籍贯：卫国

所任官职：秦孝公时丞相

生平大事记：变法图强、镇压旧贵族

非正常死亡方式：车裂

非正常死亡原因：变法过程中采取激进措施，引起敌对势力强烈不满，当敌对势力反扑时，商鞅已失去了统治者的庇护。

存照——

秦孝公初立的时候，秦国的历史走到了岔路口。在岔路口选择走哪条道路是要求有智慧的，不能蛮干，走错一步就可能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好在孝公是个不错的皇帝，他的眼光敏锐，他看出了眼前的形势，稍不慎重，就可能身灭国丧，于是，他如履薄冰，心里想着要改革，要富强，秦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孝公以前，秦国的国内情况一团糟。政局混乱，动不动就换主子。几易其主之后，国力不可避免地受到损伤。国君和大臣之间互相猜疑，不相和睦，导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要是再没人出来收拾残局，恐怕秦国就完蛋了。

孝公主政以后，励精图治，国内形势渐渐稳定下来。但国外形势





不容乐观。七雄并立各怀鬼胎，谁也不服谁，都想侵吞对方，雄霸天下。淮水和泗水之间还有十多个小国家，这些国家就像是墙上草，谁强大就投靠谁，有时候浑水摸鱼，有时候随波逐流，也不是好对付的。尤其是小国虽小，却是大国力量角逐的战场，其战略价值十分重要。

对于秦国来说，最大的忧患莫过于晋国的再次崛起。趁秦国疲惫之时，晋国掠夺了秦国的河西之地。除此之外，秦国还遭受其他邻国的不断蚕食。楚国和魏国都与秦国接壤，威胁着秦国的国防安全。魏国建筑长城，从郑地沿洛水河岸北上，侵占了上郡；楚国的势力侵入汉中，向南占有巴郡和黔中郡。对于这些，由于秦国内耗严重，没有实力应付，秦孝公姑且只能听之任之。孝公此时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那么的无助又那么的沮丧，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使国家富强的强烈欲望，现在他就缺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敢于撩拨秦国保守势力的神经，敢于为天下先地打破习惯力量的束缚，敢于义无反顾地掀起变法潮流。

由此可见，在秦孝公初即位的时候，秦国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内耗使秦国元气大损，恢复不易，外部环境又如此恶劣，还有一件让秦国很没面子的事，那就是因为秦国不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而被视为夷狄之国，这种文化上的歧视让秦孝公无比愤懑。生闷气的滋味让秦孝公如烧如灼，他觉得秦国是选择辉煌，还是选择耻辱，是选择崛起，还是选择衰落，都看他自己的了。巨大的使命感在孝公心头萦绕，他的心里默念着，秦国啊，要富强起来。

有一句话，叫知耻而后勇，知耻了但不知道发奋，这样的君王不过是庸主而已。秦孝公不是这样的君主。他深深痛心于自己国家的虚弱境况，决定重振秦国的威望，以恢复祖上秦穆公时的霸业。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秦国在他统治时期赢得了无比的赞誉，也是在他统治时期，秦国人不再低头，不再认为自己由于地处偏僻而劣于中原诸国，尊严和荣耀是秦穆公留给秦国的最宝贵的财富。

秦国人都是有一个大国梦的。孝公作为一国之主，更是时刻以复

兴秦国为己任。于是，他广施恩惠，赈济孤寡，招募战士，论功行赏，渐渐使秦国发展转入正轨，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振奋的气象。

秦孝公为了振兴秦国，发誓要找到能带领秦国走向富强的能人。他对臣下说：“秦穆公是我们秦国伟大的王，我们怀念他的时代，但我们更要超越他的时代。穆公于歧州和雍州之间的弹丸之地崛起，对内讲究文德，对外不断地开拓疆土，东面帮助晋国平定了内乱，以黄河与晋国划界，西面称霸戎狄，使秦国的土地扩张了一千余里，就连周天子都承认了秦国的霸主地位，各路诸侯纷纷祝贺，穆公的霸业让后世之人感到十分的荣耀！不幸的是，经历了厉共公、躁公、简公、出子等几代混乱的时期，国家陷于内耗，无力顾及国外事故，晋国趁机侵占了秦国的河西之地，中原诸侯鄙视秦国，视秦国为夷狄，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先父献公即位后，安抚边境，迁都栎阳，并且谋划着举兵东征，收复穆公时的故地，重申穆公时的政令，我每每想到此处，心中非常苦痛。从即日起，宾客群臣中有献奇策使秦国强大者，裂土封侯。”秦孝公的这席话全是肺腑之言，他深切痛心于国家的失落，对于自己使秦国再次复兴的强烈的使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发现秦国缺乏能人贤士，缺乏致使国家强大的智囊团支持，眼下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广招贤士，为富强秦国建言献策。秦孝公的这次讲话向外界传达了秦国求贤若渴的信息，也吹响了秦国必将重新崛起的嘹亮的号角。

裂土封侯，是非常大的诱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为了博得一个“裂土封侯”的荣耀，天下有本事的人恐怕要削尖了脑袋，使尽浑身解数地钻进孝公的彀中。孝公是下了血本的，为了能使秦国变强大起来，他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比国家的富强更令他心动了。

而此时的商鞅，尚且是魏国丞相公孙痤手下的一个小官。这大概算是他的蛰伏期。但他的上司公孙痤却是一个独具慧眼的人，他看出商鞅是个潜力股，前景不可限量。但他也看出，魏国庙小，恐怕难养





这条大龙。

公孙痤非常看重商鞅的才干，但还没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他就病倒了。病重期间，魏惠王亲自看望他，并询问，如果你不幸亡故，谁能担当相国的重任啊？公孙痤说，我的手下有个人，叫商鞅，虽然年少但有奇才，大王可以将全国的政事交给他。

魏惠王一听就愣了，商鞅？这个人是谁啊？以前没听说过这个人啊，心中很是不以为然，但却没有反驳，大概要照顾重病的公孙痤的情绪，所以只是沉默不语。公孙痤为官几十年了，看出了魏惠王心中犹疑难决，就摒去左右的人，单独对惠王说，大王如果不重用商鞅，一定要杀了他，切不可让他流落外国。魏惠王又是一愣，公孙痤这是怎么了？昏头了？不用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杀掉他？惠王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答应了。

魏惠王走后，公孙痤把商鞅叫过来，对他说，今天魏王向我询问，我死后谁可继任，我推荐了你，但看大王的脸色并不认同。作为人臣，理当先君国而后才是自己，所以我对大王说，如果不重用你就杀了你。大王答应了。你要快快逃跑，要不然就会被擒拿了。商鞅却不以为然，大王既然不听从您的建议任用我，也不会听从您的建议杀了我啊。

魏王回到宫中，对左右的人说：“公孙痤病得太严重了，令人悲伤啊！他想让寡人将全国的政事交给无名小子商鞅，真是太荒唐了！”

从魏惠王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商鞅在他的蛰伏期并不是很出众，没有引起魏国统治阶层的注意，这一点可能跟公孙痤有所关联。还有就是魏惠王并不把商鞅放在眼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孙痤在魏国来说，怎么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说的话，或者推荐的人，都是靠谱的，不是平白无故、信口胡说，他是要负责任的。但魏惠王没有考虑这一点，他认为公孙痤病糊涂了，竟向他推荐一个乳臭未干、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子，所以不屑一顾，不以为然。现在看来，魏国不敌秦国是有深刻原因的，魏惠王不信公孙痤之言，疏远



商鞅，乃是其中之一。

公孙痤的眼力是非常敏锐的，他看出了如果魏王任用商鞅就是魏国之福，如果不任用而让他流落外国，为外国效力，那就是魏国的灾难了。在公孙痤心里，商鞅是一个应时而生的奇才，如果能够得到重用，必将为国家带来强大。而魏惠王终不相用，可见他不是个知人善用胸怀大志的君王，这样的君王在那个弱肉强食、兼并激烈的时代，最终的下场只能是被兼并、被强者蚕食。历史的事实告诉后人，魏惠王对商鞅的弃而不用，是十分不明智的。

公孙痤死后，商鞅认为自己继续留在魏国，不但得不到重用，还可能随时丢掉性命，于是打算离开魏国到别的国家去。他听说秦孝公为了使秦国称霸，决心征召有才能的人，并承诺说“宾客群臣中有献奇策使秦国强大者，裂土封侯”。商鞅感到自己的出路就在秦国，便下决心到秦国去。

到了秦国以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介绍，得以和秦孝公倾心而谈。谁知这一谈一发不可收拾，帝道、王道、霸道，君臣晤面多次，畅谈天下形势，风云际会，掀开了改革变法的充满了希望而热情的新篇章。最终商鞅凭借着自己的真知灼见，受到了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对于公孙痤还需要补充几句，为什么他建议魏王，如果不用商鞅就杀掉，后来又告诉商鞅让他速速离去，免遭魏王的毒手？如此前后矛盾的行径，难道有什么隐衷？其实，这就是公孙痤的眼力的问题。世界上有两种人，这两种人聚在一起，就能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一种是所谓的能人，另一种就是所谓的能知人，而公孙痤就属于后者。他知道商鞅的才干足以辅助一方诸侯成就霸业，但他也知道魏惠王不可能成为这样的霸主，但身为魏国人，就要为魏国计，联想到商鞅将来可能帮助其他诸侯国做出有损于魏国的事情来，就建议魏王不用商鞅就杀掉他，而他对商鞅的才干又十分珍惜，不忍心看到商鞅这样有



奇才的人遭到屠戮，因此才对魏王和商鞅说了前后相互矛盾的一席话。

公孙痤的眼力致使他做出了无奈之举，如果他是个懵懂人，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公孙痤眼中的商鞅，既是幸事的化身，也是祸事的化身，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魏惠王，魏惠王如果决定重用商鞅了，公孙痤绝不会有那样的说法。不过，话又说回来，历史就是历史，不容一点假设，商鞅最终还是离开了魏国，帮助秦孝公成就了霸业。

不知道死去的公孙痤有何感想，是埋怨魏惠王还是埋怨商鞅？不得而知了。

商鞅的弃魏奔秦，也算得上是一次赌博。之前商鞅已了解到秦孝公正在招揽贤才，但对于统治者，他已不再那么热衷了，谁知道孝公的诚心能有多少呢？会不会是摆出来的高姿态？见弃的商鞅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但商鞅这个人胆大心细，他决定去秦国，就抱了赌博的心态，没准就能翻盘呢，他通过各种途径，打通了秦国宠臣景监的关节。

景监是秦孝公面前的红人，商鞅就是通过他得到机会面见孝公的，可见商鞅多少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意思。商鞅通过幸臣以求任用于当时世人所不齿，也为史家留下了诟病之辞。

但不管怎么说，商鞅总算得到了机会，而这一机会对他的人生来说十分重要。或成就一番大事业，或成为碌碌无为的庸人，只在秦孝公的一念之间，就看商鞅的言辞能不能打动他了。

可事事难预料，事情还真不像商鞅想象的那么简单。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商鞅和孝公谈了很久，可是他的话让孝公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来，可以说孝公连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谈完了，秦孝公就责骂景监，你推荐的是个什么人啊，都快把我烦死了，还说商鞅是个狂妄的人，不值得重用。景监回去就抱怨商鞅，你都跟大王说什么了？千万

不要连累我啊。商鞅说：“我跟大王谈了五帝之道，可大王志不在此，不加理会呀。”

过了五天，秦孝公又召见商鞅，这一次商鞅比上一次说得还要多，但还是不中孝公的要旨，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遂埋怨商鞅，商鞅说：“那有什么办法？我以三王之道献策孝公，孝公不听。你要再为我求得一次觐见的机会。”景监连连摇头，认为这样下去没有结果，但商鞅坚持要求再次觐见，景监不得不再次替商鞅请求。

第三次孝公接见商鞅，结果出乎意料，他认为商鞅谈得很好，但是没有采用。不过这个转折太重要了。它意味着秦孝公开始转变对商鞅的看法。商鞅就像一个老中医，接连几次给患者把脉，前几次都没切中肯綮，只有这一次脉摸得比较正，接下来就差对症下药了。

回来后商鞅以退为进，离开了一段日子。史书上没有记载他去哪了，但商鞅确实是离开了，因为他已经吊开了孝公的胃口。孝公一看没商鞅的消息了，就对景监说：“你推荐的那个宾客很好，我还想跟他交谈呢。”结果弄得景监一头雾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不是说谈不拢吗？怎么这次人家离开了，还要召回来呢？景监不明白其中的原委，就去找商鞅询问。商鞅说：“我上次觐见孝公，既不谈帝道，也不谈王道，只谈了霸道，孝公很欢喜，看起来其志在此啊，如果他再召见我，我就知道该如何说了。”

果然，秦孝公再一次召见了商鞅。商鞅在席上侃侃而谈，不知不觉中孝公在席上直向前挪动，可见这次商鞅的话十足地打动了孝公。他们君臣一谈就是好几天，但兴致盎然不知满足。

景监非常纳闷，认为商鞅这个人不可捉摸，就询问他：“你用什么方法打动了大王的心意？我看大王高兴得很啊！”商鞅春风得意地说：“我向大王进献帝王之道的策略，以求能够达到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他等不及，还说贤能的君主，扬名创业只在自身，哪能默默无闻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之业呢？因





此我就向大王阐述霸道策略、强国之术，大王大为高兴。但是这样就很难与殷、周的德治相比拟了。”

通过商鞅和秦孝公的这几次谈话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三点：一是，秦孝公胸怀大志，但并不是要做像尧舜那样的贤君，而是对春秋五霸颇为景仰，成就一番霸业，乃是他的目标。重振秦国的大国地位，使秦国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这才是秦孝公追求的。二是，商鞅这个人确实不得了，王道、霸道、杂道都是精通的，他能投君王之所好，而且往往对症下药，令当权者有一种相逢恨晚的感觉。三是，孝公的目标与商鞅的理想是有所区别的，孝公要做霸主，而商鞅想要致君尧舜，就是想要辅佐孝公成为尧舜那样的仁君贤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和孝公第一次谈话的话题就是五帝之道，但孝公不感兴趣，可是商鞅却作为首要话题，放在了谈话的首席。

经过这次君臣恳谈，孝公对商鞅的才能大致有了了解，认为这个人能帮助自己成就一番霸业，于是决定立刻重用商鞅。战国时候很多重大事件的决策都是在斗室厅堂中谋划而成的，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像后来的隆中对也是这样，大都是君臣际会，便会产生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举动。

商鞅见孝公对自己十分信任，就建议在秦国实行变法。但一厢情愿总不算什么好事情，尤其是遇到的阻力十分强大的时候，更是如此。秦国的既定利益的获得者，就是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贵族认为此举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变法，弄得秦孝公犹豫不决。

一次，秦孝公召集大臣讨论变法，会上气氛火药味十足。

商鞅首先侃侃而谈：“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那些有过人举动的人本来就会遭到世俗的非难，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人肯定会遭到庸碌之人的讥讽。愚笨的人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却在事先就能做出正确的预见。一般人不能和他们去商量革新和创造，只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做大事业的人，用

不着跟一般人商量，造就伟大功绩的人也无需征询别人的意见。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制度去办，也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

秦孝公认为商鞅讲得有道理，这些话都是自己内心里想讲的，但考虑到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考虑到自己作为君主的一种平衡的策略，此话还需要由商鞅讲出来为好。

可是，贵族甘龙却认为商鞅讲得不对，他说：“圣贤之人并不依靠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也不依靠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依据旧制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安定。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的人就会议论纷纷，造成动荡。”他劝秦孝公仔细考虑，不可轻言变法，以免引起国内骚动，造成混乱的局势。

商鞅立即反驳说：“甘龙的言论不过是凡夫俗子的话罢了。庸人才会安于现状，书呆子才会墨守成规。让这两种人做官，只能是照章办事，无所作为，要与之讨论他们所不理解的大事业，他们就会变得愚蠢。三代不同礼教而成就了王业，五霸不同法制也成就了霸业。聪明的人制定法律，愚笨的人只能受法律的管制。贤明的人会根据时移世易变更礼俗，不贤之人只能拘泥古礼裹足不前。”

商鞅想借此坚定秦孝公变法的信心，但遭到了另一贵族杜挚的反对。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能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用更换旧的东西。遵守旧法才能没有过错，依照旧礼才不会出现偏差。”杜挚希望秦孝公遵循旧法，没必要进行无谓的变革。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制度多了，应该效法哪一种呢？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不能只按一种办法行事，只要有利于富强国家，何必拘泥于古法呢？先前商汤、周无不遵循古法而成就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礼治而致使国家灭亡。违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受到非议，因循旧制的也不值得赞扬。”

孝公听了商鞅滔滔不绝的雄辩，连连称善，大加赞扬，并深有省悟地说：“鄙野小巷的人大多少见多怪，孤陋寡闻的夫子才喜欢无谓的





争论。愚人自以为是的欢喜，正是聪明人所感到可怜的。狂妄人正以为洋洋得意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拘泥于世俗的那一套议论，我不再想听了。”

于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变法了。商鞅通过这场舌战，力排众议，打击了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派力量，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这场论战说明了秦国正站在转折点上，上到君主下到群臣，都对秦国的何去何从充满了猜疑和幻想。朝内的政治势力分成两派，支持变法的，包括孝公自身，反对变法的，包括太子，两派观念交锋的力道很足，都是不遗余力的。改革嘛，总免不了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的获得者，但只顾虑他们的感受，只会使国家固步自封，不死不活下去，这是志在有为的君主不能容忍的。改革哪怕是流血，哪怕是牺牲，哪怕是动荡，挺过去了就离成功不远了。因此，在秦孝公看来，得罪甚至损害一部分贵族的利益，进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是值得的，也是没有余地可商量的。

后人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耻笑守旧者的顽固不化，但深究其根源在于变法是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伴随着血光，近代谭嗣同也承认改革是以流血开始，秦国的守旧派之所以引经据典据理力驳商鞅的主张，不过是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改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伤害，很可能这种伤害永久不能恢复，因此他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抵制变法，这也预示了商鞅的变法不会一帆风顺，相反会血腥满途。不过，有了君主孝公的支持，商鞅也就无所忌惮了，在慢慢体味改革快意的同时，一个具有毁灭他自己的力量的茧壳也随着慢慢织就，剩下的就等待着时间老人去验证了。

守旧派势力遭到了商鞅的打击，只能忍气吞声缄默不语。不过他们心中存有一个侥幸，拉开了架势要看商鞅的笑话。他们也许有此感想，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的，以后的路还长着呢，骑驴看唱本走着



瞧。

商鞅却一门心思扑在变法上，他并不把那些守旧派放在眼里，国君支持变法才是正理，他们那些人不过闹嚷嚷起腻罢了，如果有胆敢破坏变法者，刑法条条写得清楚，商鞅可不会心慈手软。

秦孝公下定决心变法，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商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内容是：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国家直接掌握全国的户口数，而且便于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家必须告发，不然就要一同受罚。告发人和杀敌者一样受奖，赐爵一级。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新法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与奖励军功相联系，对秦的爵位制度加以整顿，规定了爵位的二十个等级。宗室没有军功的，也不得享受特权，对田宅、臣妾都有明确的规定。此举在于鼓励人们为秦国的利益而勇敢作战。与此同时，变法还规定了禁止私斗。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违犯者按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处罚。其目的是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君主的权威。

三、奖励耕织，实行“重农抑商”。凡多打粮食和多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因经商及懒惰而贫困的，其全家则沦为官府的奴隶。

四、制定严厉的法令。商鞅以严厉的法令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法令制定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据说连“弃灰于道者”也要处以黥刑（黥刑是古代一种肉刑，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涂上墨）。

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前，很是费了一番周折。